





杜甫诗意图 · 《古柏行》

朱屺瞻



目 录

一九八五年第一期
(总第九期)

杜甫夔州诗研究专辑〔二〕

- 杜甫夔州诗及五言长律的我见 曹慕樊 (1)
- “乃知盖代手，才力老益神”
——杜甫夔州诗偶记 陶道恕 (8)
- 巫山巫峡气萧森
——读杜甫夔州山水诗 曾枣庄 (18)
- 形胜有余风土恶，哀哀血泪化诗篇
——读杜甫夔州诗 朱碧莲 (26)
- 关于《夔州歌十绝句》之六的注解 谭文兴 (31)
- 八哀诗的艺术构思 成善楷 (35)
- 杜诗别解三题 邓绍基 (45)
- 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探
——《杜甫为郎离蜀考》续篇 陈尚君 (52)

-
- 杜诗五解 冯汉镛 (61)
- 读杜甫《鸚鵡》、《孤雁》等咏物诗八首 邱俊鹏 (64)
- 略谈杜甫诗中所咏的刘备 濮禾章 (69)
- 杜甫夔州咏雨诗初探 杨铭庆 (73)
- 借古柏以怀人，哀材大而自伤
——试论杜甫的《古柏行》 郭世欣 (80)
- 杜诗签证补证 赵知闻 (86)
- 杜甫夔州诗例释 刘尚勇 (91)
- 关于杜甫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
中的“剑器浑脱”问题 李国瑜 (95)
- 沉郁顿挫，独出冠时
——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》赏析 李 炎 (100)
- 《杜诗镜铨》批抄 (二) 程千帆 (103)
-

CAO TANG

(THE THATCHED COTTAGE)

1985, No. 1 (General Serial No. 9)

A Symposium on Du Fu's Poetic Writings in Kuizhou

(continued)

- My Personal View on Du Fu's Poems Written in Kuizhou
and the Lengthened Regulated Verses (*chang lu*)
in Five-character Lines Cao Mufan (1)
- A Casual Talk on Du Fu's Poems written in Kuizhou
..... Tao Daoshu (8)
- Du Fu's Poems about the Landscapes of Kuizhou
..... Zeng Zaozhuang (18)
- Notes to the Sixth Verse of *Chants of Kuizhou*
in Ten Quatrains Tan Wenxing (31)
- The Artistic Conceptions in Du Fu's *Eight Memorial
Poems* Cheng Shankai (35)
- Some New Interpretations of Du Fu's Poems
(Three items) Deng Shaoji (45)
- A Survey of Du Fu's Life in Chengdu during His Term
as Ministry Councillor and the Cause of His
Departing Sichuan (The Sequel) Chen Shangjun (52)
- Five Topics on Du Fu's Poems Feng Hanyong (61)
- Reading the Eight Poems about Eight Intimate Objects:
Parrot, Solitary Wild Goose and Others Qiu Junpeng (64)
- Supplement to *The Textual Research of Du Fu's Poems*
(1) Zhao Zhiwen (86)
- Exemplary Explanations of Du Fu's Poems Written
in Kuizhou Liu Shangyong (91)
-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Meaning of *Jian qi hun tu*
in Du Fu's *Watching Madame Gongsun's Disciple Dancing
to the Music of jian qi* Li Guoyu (95)
- Comments on *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Du Fu's Poems*
(2) Cheng Qianfan (103)

杜甫夔州诗及五言长律的我见

曹 慕 樊

从宋以来，人们对杜甫夔州诗的评价就有争论。最初肯定夔州诗的是大诗人黄庭坚。他在《大雅堂记》、《刻杜子美巴蜀诗序》等文中，高度评价夔州诗。如说，“欲尽刻（子美）东西川及夔州诗，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。”（《豫章黄先生文集》卷十六）。又《与王观复书》（其一）说：“好作奇语，自是文章病。但当以理为主。理得而辞顺，文章自然出类拔萃。观杜子美到夔后诗，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，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。”（同上卷十九）

南宋大哲学家、诗人朱熹却颇持异议，说：“杜诗初年甚精细，晚年旷逸不可当。如自秦川入蜀诸诗，分明如画，乃其少作也。”按少陵乾元二年（公元759）弃官入蜀，四十八岁，不为少。考亭这里说的，对杜晚年诗似无贬抑之意。

但又说：“杜甫夔州以前诗佳。夔州以后，自出规模，不可学。”（《诗人玉屑》卷十四引）又说：“人多说子美夔州诗好，此不可晓。夔州（诗）却说得郑重烦絮，不如他中（年？）前有一节诗好。今人只见鲁直说好，便都说好。如矮人看场耳。”（明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六引）

陈善《扪虱新语》曰：“谢玄晖曰‘好诗园美流转如弹丸。’……观子美夔州以后诗，简易纯熟，无斧凿痕，信如弹丸矣。”

〔明〕胡应麟说：“凡诗初年多骨格未成，晚年则意态横放，故惟中岁工力并到，如

老杜之入蜀，篇篇合作，语语当行，初学当法也。夔峡以后，过于奔放。视其中年，精华雄杰，如出二手。盖或视之太易，或求之太深，或情随事迁，或力因年减，虽大家不免。世反以是为工者，非余所敢知也。”

（同上书引）

清黄生《杜诗说》曰：“杜公近体分二种：有极意经营者，有不烦绳削者。极意经营，则自‘破万卷’中来；不烦绳削，斯真‘下笔有神助’矣。夔州以前，夔州以后，二种并具，乃山谷、晦翁，偏有所主，不知果以何者拟杜之心神也？”

〔清〕赵翼《瓯北诗话》说：“黄山谷谓，少陵夔州以后诗，不烦绳削而自合，此盖因集中有‘老去渐于诗律细’一语，而妄以为愈老愈工也。今观夔州后诗，惟《秋兴八首》及《咏怀古迹五首》，细意熨贴，一唱三叹，意味悠长。其它则意兴衰飒，笔亦枯率，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。……朱子尝云：‘鲁直只一时有所见，创为此论。今人见鲁直说好，便都说好，矮人观场耳。’斯实杜诗定评也。”

上面略引从宋到清诗人、学者对杜夔州以后诗的评价文字。黄庭坚的理由是明白的：杜夔州后诗，“理得而辞顺”，无好奇的毛病。朱熹的话有自相矛盾的地方。初说“旷逸不可当”，似乎不必是贬词。但又说“自出规模，不可学。”“自出规模”为什么就“不可学”呢？“自出规模”和“不随

人后”在古代诗文评中，意义近似，习惯上都用为褒义语。既然是不坏的作品，为什么“不可学”？如果说夔州诗不落寻常蹊径，初学难于入门，所以不宜学，倒不失为一种理由。但他又说“夔州诗‘说得郑重烦絮，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。’”这里意思倒是明确的。“郑重”一词，当是“烦絮”的意思，（见《汉书·王莽传》注）或宋时还有这种话。如果我这样解释不错。那末，朱熹的话当是指杜甫夔州以后的五古如《八哀诗》及五言长律。四十韵乃至一百韵的长律，那倒确是初学者不可学的。（关于杜五言长律的评价，下文有论。）

胡应麟批评杜夔州以后诗的疵病是“过于奔放”，看他用来与夔州诗相形的中年（秦州到成都以后）诗是“精华雄杰。”可以推知胡元瑞的意见，是说夔州诗草率平庸。果真这样吗？“精华”是说精深华妙？难道《秋兴八首》、《诸将五首》、《咏怀古迹五首》、《阁夜》还够不上精深华妙？难道《古柏行》、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还够不上意态雄杰吗？《明史·文苑传》称应麟著《诗薮》，大抵奉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为律令。以世贞为诗家集大成者，有如孔子。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引）这种傍后七子门户的人的偏见是不足重视的。

赵翼的意见也贬低杜夔州诗。总的评语是说夔州诗“意兴衰飒，笔亦枯率。”是旧日（杜诗）“豪迈沉雄”的反面。按赵翼所指责的“衰飒”或略如现代所说的“消极”，那么赵氏所崇拜的《秋兴八首》中如“听猿实下三声泪”，“百年世事不胜悲”，“白头吟望苦低垂”，何尝不可目为衰飒？同样，《咏怀古迹五首》中如“庾信生平最萧瑟”，“摇落深知宋玉悲”，“志决身歼军务劳”，和“蜀主窥吴幸三峡”全首，都难逃“衰飒”的非难，同时亦可以认为“枯率”；何以又不害为“细意熨贴，一唱三

叹，意味悠长”呢？除《秋兴》、《咏怀古迹》以外，夔州诗能断言尽是“衰飒”、“枯率”之笔吗？即以近体而论，《诸将五首》，历来诗家均推为杰作。现以第二首“韩公本意筑三城”为例，录诸家评语：起四句，方东树评：大往大来，一开一合，所谓“来得勇猛”（按四字是归有光评《史记》文语），“乾坤摆雷硠”也。次联，杨伦评：“对法不测，有龙跳虎卧之观。”方东树说：五句宕接，六句绕回，笔势宏放。邵氏评：通首一气转挽。其它几首，我看也无懈袂可击。而赵翼不取，为什么？瓯北评论的偏颇，是难服人心的。

黄白山的《杜诗说》，《四库总目提要》评价不高。我认为不大公允。应该承认，清初诸家论杜诗艺术性的，白山高过吴瞻泰，是颇具隻眼的杜诗评论家。但他在上引的论杜夔州诗的话里，却嫌未中肯綮。黄山谷，朱晦庵的评论都着眼于杜公中、晚期诗的比较。胡元瑞所论虽扬抑不当，却提出一个理论问题，他是想建立一条规律：任何诗人的创作，早年骨格未成，晚年则意态横放，惟中岁工力并到，神情俱茂。这话可以研究。无论如何他所持一个诗人随着时事推移，阅历甘苦，诗风必会随之而变的这个观点是不错的。黄白山从诗艺着眼，抛开诗人阅历不管，是悖理的。反而不及胡元瑞。

黄白山和赵瓯北论点相去颇远，但同有一缺点，就是都违背“知人论世”的批评原则。瓯北《论诗绝句》：“自身也有初中晚，安得千秋尚汉唐？”的议论，好像是能“知人”，但在论杜夔州诗的言论中，却又责备夔州诗的“衰飒”，这是违背“论世”原则的。自来人随世变，世有盛衰，所以诗示苦乐。杜公身历三朝，“支离东北风尘际，飘泊西南天地间”。他的夔州诗，正是“穷者欲达其言，劳者须歌其事”。除非诗不是“心声”，诗是“心声”，就不能要求

盛世的诗人不欢笑，也难使衰世的诗人不忧愁幽思。黄白山丢开诗人的身世不管，赵瓯北只许诗人兴高彩烈，不许唉声叹气，这能行吗？他和黄白山所犯的理论错误实质是同类的，就是违反了诗随人异，人随世变的道理。

我个人的意见是：“杜甫夔州时期诗，宋人评价极高，现代似偏低，这是应该专门讨论的问题。夔州诗是不能贬低的。第一是量多；第二，带总结性的组诗值得注意。如《诸将五首》、《咏怀古迹五首》、《秋兴

八首》等，脍炙人口至今；第三，诗境广阔深邃，为前此所无；第四，创五言长律大篇，多至一百韵，内容写实，词气精拔纵横。”这四点浅见，是我在拙文《杜甫在夔州东屯的经济状况》后的“附记”摘要。

（见《杜诗杂说》。一九八一年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66页）现在略作补充说明：

（一）夔州诗篇章的数量，占杜甫各创作时期的第一。现在据浦起龙《少陵诗目谱》把杜诗各篇数统计比较如下表：

分期	杜甫活动地区	诗篇数	唐 纪	公 元
一	齐、鲁、东都	23首	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到天宝四载	736—745
二	长安（包括白水、鄜州）	299首	天宝五载到肃宗乾元二年	746—759
三	秦州	159首	乾元二年春到年终	759
四	成都（包括梓、阆、汉州）	422首	乾元二年冬至永泰元年	759—765
五	云安（自成都至云安）	44首	永泰元年至大历年	765—766
六	夔州	428首	大历年春至三年春	766—768
七	湖北、湖南	148首	大历三年正月至五年冬	768—770
合计		1423首	合计三十四年	736—770

上表如果以云安期附属于夔州，那末夔州时期共有诗四百七十二首。时间实际不足三年。比长安时期，时间少六年，诗篇却多两倍有余。比成都时期，时间少二分之一，诗篇反多五十首。

在这个统计比较表上能看出什么问题呢？

杜甫一生，活了五十九岁。玄宗时代占四十五年，肃宗时代五年，代宗时代占九年。代宗即位以后，从宝应至永泰这四年，

正是杜甫由成都到夔州的时期，中国大乱，外族侵暴、民不聊生。这里略举祸乱，如宝应元年（762年），玄、肃宗相继死。奴刺、党项入侵。宦官李辅国杀（肃宗）张皇后及越王李系。河东军叛，杀节度使邓景山。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。台州人袁晁起义。回纥兵助讨史朝义，入东京大掠。解李辅国兵权，却以宦官程元振代之。宝应二年改元广德（763年）史朝又兵败自缢死，安史之乱结束。原附安史的河北诸将，先后降唐，尽

据河南、北二十四州，皆为节度使。吐蕃攻入长安大焚掠。代宗出奔陕州。吐蕃攻陷剑南的松、维、保三州。广德二年（764年）仆固怀恩引回纥、吐蕃入寇。长安戒严。永泰元年（765年），仆固怀恩引回纥、吐蕃、吐谷浑、党项、奴刺入侵。剑南西山都兵马信崔旰杀节度使郭英义。邛、泸、剑三州起兵讨旰，蜀中大乱。

时局越乱，君相越庸，越与诗人的理想背道而驰，诗人的痛苦就越深，其所激发的忠悃也越深，愤怒越盛，诗思也就喷薄而出，不可遏止。司马子长评文章，以为“诗三百篇，大氏贤圣发愤之所为作。”又论

“屈原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……明道德之广崇，治乱之条贯……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这似乎可以移评杜诗。总起来说，唐政局的危殆，杜甫自许有扶危的本领，又有亲阅三朝由盛到衰的经历，加上他狂热严肃的性格，穷迫困顿的生活，在晚年汇集爆炸，表现出来，就是夔州诗。这几项中，经历和性格是主要的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十七，

“客观之诗人，不可不多阅世。阅世愈深，则材料愈丰富，愈变化。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之作者是也。主观之诗人，不必多阅世。阅世愈浅，则性情愈真，李后主是也”。静安先生的话，后半是错误的。不深入世界，绝不能表现世间，不能深入表现世间，也就拯救不了世间。而无拯世抱负的诗人，绝非伟大诗人。静安先生论后主词，说“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。”

（《人间词话》十八）不无溢美。后主断无此境界，古今大诗人可以当此语者唯有屈原和杜甫。亦惟有王静安说过：“三代以下之诗人，无过于屈子、渊明、子美、子瞻者。此四子者，若无文学之天才，其人格亦自足千古。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，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，殆未之有也。”（《文学小言》）现在且论屈杜。屈杜的志、行、辞，可以说

是：并白雪以方洁，干青云而直上。或说：其志可以抗浮云，其诚可以裂金石！现在且略举其辞：

“既替予以蕙纕兮，又申之以揽芷。亦予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！”（替，废棄。纕，佩。申，重。揽，结。前二句是说：我既因为佩蕙而被弃，却又重新带上香芷。表示“守死善道”。（屈原《离骚》）

“呜呼！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。”（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）

“下悯百鸟在罗网，黄雀虽小犹难逃。愿分竹实及蝼蚁，尽使鶗鴂相怒号”（杜甫《朱凤行》）！虽说狂热严肃，执德不回是屈杜两大诗人的共同性格，但毕竟杜甫自有其由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形成的特点的个性，不同于屈原。杜甫的斗争性更多一些，平民的傲慢粗疏显得突出。对于看不顺眼的现象，时时禁不住破口大骂。如说：“关中小儿乱纪纲，张后不乐上为忙”（《忆昔二首》）。如说“自古圣贤多薄命，姦雄恶少皆公侯”（《锦树行》）。如说：“高马达官厌酒肉，此辈（人民）杼柚茅茨空”

（《岁晏行》）！夔州诗之所以可贵，就在其充分表现了诗人的个性，或“自己的声音。”

现在再辨明与夔州诗有关的三个问题：

（一）“诗史”是什么意义？（二）夔州的“总结”是不是无可奈何的追怀昔日的荣华？（三）夔州诗是不是小地主声音？第一个问题是杨慎提出来的。《升菴诗话》卷十一“诗史”条说“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，谓之‘诗史’。鄙哉宋人之见，不足以论诗也。”下文说，诗与史各有其“体”。诗贵“意在言外，使人自悟。至于变风变雅，尤其含蓄。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。……不必曰‘慎莫近前丞相嗔’，……不必曰‘千家今有百家存’……不必曰‘哀哀寡妇诛求尽’，……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

矣。……至于直陈时事，类于讪讦，乃其下乘末脚，而宋人拾以为已宝，又撰出‘诗史’二字以误后人。……”按“诗史”一词，见〔唐〕孟棨《本事诗》“高逸”第三，曰：“杜逢禄山之乱，流离陇蜀。毕陈于诗，推见至隐，殆无遗事，故当时号为‘诗史’。”升菴归狱宋人，偶失检。至于“诗史”之义，不过是说善于反映、讽刺时事。考《诗·大序》明说“下以风（讽）刺上”。

“谲谏”不过是表现法的一种，不能说诗都应该这样。看《小雅·巷伯》：要“取彼谮人，投畀豺虎。”拿来与《书·汤誓》“时（此）日（代夏桀）曷（何时）丧（亡）？予及女（汝）偕亡！”比较，诗与史并无不同。司马迁说《离骚》“上称帝喾，下道齐桓，中述汤武，以刺时事。”足见我国诗歌自来有此传统，故史家不以为怪。亦不是说定要纪述时事，只要论断时事，虽抒情诗亦可称史。杜诗直陈时事，足见诗人的性情（个性）。“主性情”理应与託讽刺不相违背，含蓄蕴藉之外，大有诗在。升菴所见，病在不广。放翁亦不喜“诗史”的称号（《读杜诗》），亦误解。（二）夔州诗多回忆的内容，比如常常提到自己曾作“郎官”的事，如“不才名位晚，敢恨省郎迟。”（《夔府书怀四十韵》）又如“欲陈济世策，已老尚书郎。”（《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》是否怀恋荣华？陆务观《秋兴》之二说：“功名不垂世，富贵但堪伤。底事杜陵老，时时矜‘省郎’？”似尚不解此翁的心情。《晚登瀼上堂》诗说：“四序婴我怀，群盗久相踵。黎民困逆节，天子渴垂拱。……衰老自成病，郎官未为冗（无事可做叫冗）。凄其望吕、葛（吕尚俗称姜太公。葛，诸葛亮），不复梦周、孔（周公、孔子）！……”因为志在尊主隆民，所以丢掉郎官也觉可惜。省郎省郎，“富贵”云乎哉！（三）郭沫若同志曾说，杜甫在夔州当了小地主，所

以写不出好诗来（《李白与杜甫》）。我曾据宋人文献作了点考证，结论是杜甫在夔买了十一亩田，连一个柑园，家中却有十口人，生活非常拮据（详《杜甫在夔州东屯的经济状况》）。照唐代的功令，杜甫一家人占有的田数，才及一个农民占田（一顷）的十分之一。论实际生活水平，口粮尚须借贷。听他说：“荒戍之城石色古，东郭老人（诗人自说）住青丘。飞书白帝营斗粟，琴瑟几杖柴门幽”（《锦树行》）。诗下半尽是冷嘲热骂，显然是悲愤交集的。如果我们仿照韩愈、白居易的说法，说是人间天上都要好诗，所以天使杜甫这样痛苦。他们的话可以看作杜甫夔州诗好（当然不止夔州诗）的生活上的说明。

上面谈了夔州诗篇章多，好诗也多，回忆诗（总结经验）的意义，“诗史”的意义等。我想再说几句关于夔州诗境广阔深邃的话。说广阔，是说杜甫居夔以后，对各体诗都有创新，效果有好有坏。五古如《八哀诗》，就有意以文为诗，像史家传赞，除汝阳王一首外，几全是为人平反昭雪。笔墨苍老横放，殊少姿媚。所以许多人不喜欢它。五律有时有意作粗率语，如《九日诸人集于林》三四句：“老夫难早出，贤客幸知归。”又有变对句，如《月三首》之二的“羁栖愁里见，二十四回明。”乃当句对，兼十字句，几乎不觉得是律对。又《子规》五六句：“眇眇春风见，萧萧夜色栖。”《杜臆》以为十字句。七律连章，组织严密，每首起结构带，有整齐回环的美。如《秋兴八首》、《诸将五首》（五首咏五方，罗膺中先生说）等。七绝连章，如《解闷十二首》、《承闻河北诸节度使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》，入口生、拙、重，绝去熟腐的毛病，大启宋人塗轨。就诗艺论，除才、识、学之外，可说是“身大不及胆。”用庄子的话，叫做“猖狂而蹈乎大方。”

关于夔州诗的幽邃之境。如《船下夔州，郭宿，雨湿不得上岸，别王十二判官》的“晨钟云外湿。”早经叶燮拈出（请看《原诗》，此不赘）。它如《移居夔州作》的“春知催柳别，江与放船清”。《热三首》的“故国愁眉外。”《月》的“四更山吐月，残夜水明楼”。《王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》的“江城愁日落，山鬼闭门中”。（参《移居公安山馆》的“山鬼吹灯灭，厨人语夜阑。”）《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》之二的“畏人江北草，旅食瀼西云”。夔州诗中这种句子不少，这里不过随手举例，要解释、翻译它颇不容易。如东坡曾激赏“残夜水明楼”，人都知道确是好诗，但要说清它为什么好，似乎颇难。又不但近体有，古体也有，如《缚鸡行》的“鸡虫得失了无时，注目寒江倚山阁。”《听杨氏歌》的“勿云听者疲，智愚心尽死”，都是现境，不依靠华词俊语，却引人离去浮华，直与“诗”会。也不纯是写幽深或平淡的情景，尽有写变怪之境的，这倒是杜诗的读者习见的了，如《君不见简苏溪》的结语：“深山穷谷不可处：霹雳魍魎兼狂风！”试把这些诗对照入蜀以前诗读，就会觉得夔州诗由于诗人阅世愈深，诗作也愈益由心灵深处涌出，而且愈向人展示他的心、眼、手的变动光明。

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，我想略谈杜甫夔州时期的五言长律。极力推崇杜的长律，在唐代是元稹、白居易。元的论点因为在这方面抑李扬杜，大为后世疵议，元好问《论诗绝句三十首》说，“排比铺张特一途，藩篱如此亦区区。少陵自有连城璧，争奈微之识珷玞。”按遗山之论，亦不足以服人。元稹是说，唐代文人，承历世文体，各专一能，到了杜甫，各体兼善，所谓“尽得古今之体势，而兼人人之所独专。”曹丕《典论、论文》亦说：“……四科不同，故能之者偏

也。唯通才能备其体。”元稹不过说杜甫是通才。下文比较李杜，才提出五言长律一体来，说“至若铺陈终始，排比声韵，大或千言，次犹数百，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；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。”李白不是不作长律。

〔明〕高棅《唐诗品汇》卷七十四，录太白五言长律十一首；〔清〕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卷十七，录太白五言长律五首。沈氏说：“五言长律，陈、杜（审言）、沈、宋，简老为宗。燕、许、曲江，诣崇典硕。老杜出而推扩之。精力团聚，气象光昌。极人间之伟观。后有作者，莫能为役。”中国文学史上出现骈体文和格律诗，是因为汉字一字一音，音又分四声这个客观事实做根据而形成的，绝不是由于杜甫个人的偏爱。唐人多喜欢作五言长律（元结一派例外），即如韩愈，是极力反对骈体文的，诗却做长律，《县斋书怀》似乎可称五言长律的杰作，因此不能偏怪杜甫作俑。即使世无杜甫，亦必定有人做长律，长律早已是六朝文学的潜在性了。有人说，杜甫是继承祖父的诗艺的。审言有《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》五言长律四十韵，杜甫为长律乃是继承家学。这不过是偶然的因素，汉语四声才是产生律诗的必然因素。唐诗人之大做五言长律，正如今天的诗人不做五言长律，都是合理的。一般说，总是社会风尚驱使人，杜甫不过具备了推助风气的条件，所以由他出场。夔州诗中，五言长律共三十七首，名篇不少，现在略说《夔府书怀四十韵》，藉以略陈鄙见。

昔罢河西尉，初兴蓟北师。不才名位晚，敢恨省郎迟。扈圣崆峒日，端居滟滪时。萍流仍汲引，樗散尚恩慈。遂阻云台宿，常怀《湛露》诗。翠华森远矣，白首飒凄其。拙被林泉滞，生逢《酒赋》欺。文园终寂寞，汉阁自磷缁。病隔君臣。

议，惭纤德泽私。扬镳惊主辱，拔剑拔年哀。

这首诗，仇、浦注解都不得要领，不得不为新说。上面所引的是第一大段，用三朝事总起。前八句，第一小节。“昔罢”二句，玄宗朝。玄宗拨乱反正，致太平三十年，并且于少陵有知遇之恩，所以首先提起。但唐室祸乱，亦自玄宗开端，劈头大书“薊北师”，乃是《春秋》笔法。“不才”三句，肃宗朝。说脱贼赴凤翔拜拾遗事，却只一句截住。“端居”三句，代宗朝。“萍流”二句，隐带广德元年（七六三）召授京兆功曹参军事。以上总提三朝。“遂阻”以下，分疏。“遂阻”八句，概述玄、肃两朝的己身经历，是昔；末四句以感激语结束第一大段，其中“遂阻”二句与“翠华”二句，双带玄、肃宗（他们在宝应元年先后死去）。“拙被”四句，说已被朝廷疏斥的原因，引过自责，用《春秋》“为尊者讳”例（仇解酒赋、磷缩均误，见《杜诗杂说》解）。“病隔”四句，是今。“主辱”指吐蕃入长安，代宗奔陕，二句劲结。

社稷经纶地，风云际会期。血流纷在眼，涕洒乱交颐。四渎楼船汛，中原鼓角悲。贼壕连白翟（朱注，指鄜、延二州），战瓦落丹墀。先帝（指肃宗）严灵寝，宗臣（仇以为指郭子仪）切受遗。恒山犹突骑，辽海竟张旗。田父嗟胶漆（所以为弓），行人避蒺藜。总戎存大体，降将饰卑词。楚贡何年绝，尧封旧俗疑。长吁翻北寇，一望卷西夷。（第二大段）

这一段由肃宗入代宗朝。先说肃宗遭乱及临终託郭子仪以收河东之事（《旧唐书》郭子仪传）。诗意实指唐室信宦官鱼朝恩而忌子仪，故接“恒山”四句，是说河北兵连祸结。“总戎”二句，说河北降将不入朝，

系副元帅仆固怀恩养以自重，遂成新的割据之局。《诸将五首》说：“总戎皆插侍中貂”，又说：“沧海未全归禹贡，蓟门何处尽尧封？”与此参读，诗旨更明白。“长吁”句说朝廷信仆固怀恩，致使北方原本无事而翻为寇乱。“一望”句说不信郭子仪而吐蕃席卷西北。

不必陪玄圃，超然待具茨。凶兵铸农器，讲殿辟书帷。庙算高难测，天忧实在兹。形容真潦倒，答效莫支持。使者分王命，群公各典司。恐乖均赋欵，不似问疮痍。万里烦供给，孤城最怨思。绿林宁小患，云梦欲难追。即事须尝胆，苍生可察眉。议堂犹集凤，贞观是元龟。处处喧飞檄，家家急竞锥。萧车（汉萧何以萧何为太守）安不定，蜀使（司马相如）下何之？

（第三大段）

这一段论代宗朝政事，长十二韵，是诗旨重点，即所谓“以诗当谏书”。第一小节中“不必”二句，用〔汉〕谷永书意，说仙不可求，二句一气读，参看《复舟二首》。代宗是既信佛又信神仙的。“凶兵”二句，说“天下兵仙不自供”，民间诛求已尽，自救之道只在力求节俭。“答效莫支持，”说欲答国恩，苦无援助。“使者”八句是第二小节。说中使频出，无非催索赋税，何益于民！“孤城”指夔。“即事”四句是第三小节。说朝非无人，患在庙算不以贞观为元龟，可知“庙算高难测”一语实深致讥讽，好像《秦州杂诗二十首》的“唐尧真自圣，野老复何知！”

处处四句是说地方官吏不得人，只知催科，不知爱民。《同元使君〈春陵行〉》序说：“当天子分忧之地，效汉朝良吏之目。今盜贼未息，知民疾苦，得结辈十数

（下转30页）

“乃知盖代手，才力老益神”

——杜甫夔州诗偶说

陶道恕

大历元年（766），杜甫五十五岁时飘泊到夔州。在夔不到两年，写诗四百余首。刘克庄说：杜甫“蜀中诸诗，惟夔最多。”由于长期生活磨炼，夔州诗思想感情更加复杂、深沉，由于不断积累创作经验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了进一步发展。李纲说杜诗“句法理致，老而益精，”刘克庄说杜甫夔州“以后诗作”，年虽老而“才”“气”（《刘忻父诗序》）未衰，”评价都很中肯。

（一）

杜甫在夔，生活暂得稳定。他同当地官员柏中丞、严明府等虽时有往来，并受到资助，但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比成都时期都明显下降。夔州的历史文物、山水景色，对他思想的净化，胸襟的开拓，无疑起了重要作用。这使他能安静下来，用五古和五排的形式，进行全面的生活总结。

五古中既有《壮游》式的自传体，也有《昔游》、《遣怀》式的随笔体。前者概述一生经历，后者回顾某一生活片断，《壮游》从七龄“咏凤凰”写到“老病客殊方”，从“出游翰墨场”写到“廷净守御床”，从“东下姑苏”，“放荡齐、赵”写到“西归”长安。既有“奏赋入明光”的个人仕履，“论交入酒垆”的朋旧交游，更有对安史之乱前后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议和“下感万民疮”的“忧愤”。五排《秋日夔府咏怀》也

带有自传的性质。所不同者，《壮游》详到夔以前，《咏怀》详到夔以后，好比自传的正续篇。

南宋爱国诗人游陆在《东屯高斋记》中推许杜甫为“天下士”，认为他即使“落魄巴蜀”，“规模志意”仍然不小。“至夔”后，“客于柏中丞、严明府之间，如九尺丈夫，俯首居小屋下，思一吐气而不可得。”陆游读杜《壮游》诗“至‘小臣议论绝，老病客殊方’之句，未尝不流涕”，嗟其“辞之悲乃至是。”正因为陆游深受《壮游》的艺术感染，才对它如此推崇。陆游深知：“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，不胜爱君忧国之心”，可是不能“少出所学”，济时救民，以致“身愈老”，“坎廪且死”，“其悲是此”，也就“无足怪”了。刘克庄更为肯定《壮游》，说它在杜甫“五言古风中，尤多悲壮语”。“虽荆卿之歌，雍门之琴，高渐离之筑，音调节奏，不如是之跌荡豪放也”。

（《后村大全集》卷一百八十二）陆、刘两人对《壮游》备极称赞，可见它在杜诗中的重要地位。

和总结生活经验相联系，杜甫在夔，也对创作进行系统总结。早在成都，杜甫就用组诗形式评论古今诗人的得失，写成《戏为六绝句》。到夔后，又写出全面总结历代诗歌创作经验（从诗、骚、汉魏六朝，直到唐代）的五排《偶题》。诗中特别谈到自己的

创作甘苦：“法自儒家有，心从弱岁疲”。这等于是为诗集写的“自序”（王嗣奭）。另外，他又用组诗形式写了具体评论当代诗人（郑审、薛据、孟云卿、孟浩然、王维）和自叙学诗心得的《解闷十二首》。其他诗作更多次涉及古代和唐代诗人及其作品，其中包括他从祖父杜审言那里继承下来的诗学源流。

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。（《偶题》）杜甫把写诗看作是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千秋盛业，认为不能掉以轻心。“作者皆殊列，名声岂浪垂。”每一个有良心的作者都有责任贡献自己的力作，为祖国的诗歌艺术宝库增添光采。杜甫当然有更大的雄心壮志。“不敢要佳句，愁来赋别离。”乃是他自谦之词。和他所说“文章一小技，于道未为尊”，（《贻华阳柳少府》）用意相同。他忘不了写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时的创作激情：“忆在潼关诗兴多。”（《峡中览物》）他用“诗是吾家事”训示儿子，要他重视汉魏六朝诗人的艺术成就：“熟精文选理。”（《宗武生日》）他也毫不低估当代作者的水平：“吾人诗家流，博采世上名。”（《同元使君〈春陵行〉》）“他乡阅迟暮，不敢废诗篇。”（《归》）他确是“以诗为生平要事，直欲藉以垂训千古，非但作惊人语也。”他不只在内容上“剖心沥血，写出良心之所不容已，而古今词人所不能到。”（仇兆鳌）还在艺术上精益求精：“新诗改罢自长吟”，（《解闷十二首》）“晚节渐于诗律细。”（《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》）由于杜甫认真总结创作经验，他的夔州诗的思想与艺术，才达到了新的高度。

杜甫对过去的生活和创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，大大有助于扩大生活视野，加深思想与艺术修养。这必然会在夔州诗中充分反映出来。

（二）

杜甫夔州诗内容丰富、充实，表现出复杂而深沉的特点：

（甲）对国计民生的深刻关怀：杜甫到夔后，继续关心国家大事，关怀民生疾苦，诗中随时流露忧国忧民思想。他对战乱给国家造成的大创伤，痛心至极：“烟尘多战鼓”，（《摇落》）“世乱戟如林”，（《峡口二首》）“十年戎马暗万国”，（《愁》）“野哭千家闻战伐。”（《阁夜》）他对时局十分关注：“社稷堪流涕，安危在运筹。”（《西阁口号呈元十一》）还想对朝廷有所贡献：“时危思报主，衰谢不能休”。（《江上》）他把长安当作国家的象征，常引安史之乱、吐蕃之祸为沉痛教训，在一些组诗中，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感情。这些诗作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即通过回忆安史乱前太平盛世的景象，针对眼前干戈离乱的现实，寄托自己深沉感慨。七律如《秋兴八首》、《诸将》，五律如《洞房》等八首，都有代表性。《秋兴》集中表现了诗人身在夔州，心向“京华”的感情。它由夔州的暮、夜、晨转向长安的宫阙和名胜。它“以第一首起兴，而后七首俱发中怀”。第一首“孤舟一系故园心”的“‘故园心’三字固是八首之纲”，第四首“故国平居有所思”的“‘故国思’，即‘故园心’而换一‘国’字，见所思非家也，国也，其意甚远”。“后面四章皆包括于其中”。（《杜臆》）杜甫怀念故国的思想，通过“力扛九鼎，勇冠三军”（郝敬）的笔力，得到了成功表现。

可和《秋兴》“表里参观”的是《洞房》等八首。第五首《历历》前四句“历历开元事，分明在眼前，无端盗贼起，忽已岁时迁。”是八首的纲领。前四首“说承平之世，故以‘开元事’括之”。后三首“说乱离以后，故以‘盗贼起’包之。”仇兆鳌说

《秋兴》、《洞房》诸诗，“有关国家治乱兴亡，寄托深长”，堪称杜甫“聚精会神之作。”

足以和《秋兴》并称的是“以诗当纪传，议论时事”的《诸将五首》。时安史之乱虽平，边患仍未根除，故对手握兵柄的方镇诸将进行针砭：“诸君何以答升平”；“安危须仗出群才”。诗人大有激发武将们的爱国心之意。《诸将》迥异“吟风弄月”“登眺游览”的“任兴漫作”，“必有子美忧国之真心，又有其识学笔力”（郝敬），才能写出。

《秋兴》、《诸将》同杜甫在梓州、成都为吐蕃陷京、藩镇跋扈而写的《有感五首》、《伤春五首》，后先呼应，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。《秋兴》的题目和《伤春》近似，《诸将》的题材与《有感》略同，它们反映了杜甫在不同时期对国事的忧虑。

杜甫对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，更为义愤填膺。他叹息赋敛深重，征戍苛虐：“苍生今日困，”（《奉送王信州鉴北归》）“诛求异俗贫。”（《东屯北崦》）“八荒十年防盗贼，征戍诛求寡妇哭”。（《虎牙行》）“安得务农息战斗，普天无吏横索钱。”（《昼梦》）他盼望再看到安史乱前的太平景象：“军旅都应息，寰区要尽收。”（《奉送王信州鉴北归》）他因天热而为不得“解甲”的“征成人”“沾巾”（《热三首》），认为兵荒和旱灾相比，后者还“愈”（《雷》）于前者。他主张“先偃甲兵”，更减轻赋役，使老百姓各安其业：“几时高议排君门，各使苍生有环堵。”（《寄柏学士林居》）

《同元使君春陵行》是夔州诗中值得重视的关心民瘼之作。杜甫在“序”中感叹“今盗贼未息”，希望朝廷重用元结式的官员，达到“天下小安”。赞扬元结“知民疾苦”：“道州忧黎庶，词气浩纵横。”《春

陵行》和元结的《贼退示官吏》，真可谓“两章对秋月，一字偕华星。”足与星月齐光。惊叹“不意复见比兴体制，微婉顿挫之词”。他深佩小他十一岁的元结的艺术天才。“感彼危苦词，庶几知者听。”写成和章，以广流传。

杜甫在夔，亲眼看到劳动人民为赋敛征戍所折磨的血的事实。杜甫在《驱竖子摘苍耳》中，对此作了形象描绘：“乱世诛求急，黎民糠粃窄。饱食亦何心，荒哉膏粱客。富豪厨肉臭，战地骸骨白。”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杜甫入蜀前《奉先咏怀》中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思想的艺术体现。杜甫认识到：贫富悬殊是人民痛苦的根源，是产生一切社会“悲”剧的基础：“无贵贱不悲，无富贫亦足。”（《写怀二首》）

官府的赋敛，导致夔州民不聊生，杜甫在《甘林》中，通过“邻里”“长老”之口，加以生动揭露。“时危赋敛数”，老百姓把仅有口粮缴完赋税，还得把“豆田”里的“子实”，“货币送王畿”，因为“公家威”“迫”得厉害，自产的粮食“不得吃”，却“尽添军旅用”了。《又呈吴郎》是征戍赋敛迫使夔州劳动人民家破人亡的一个缩影。这位“无食无儿”的寡妇到瀼西草堂前“扑枣”，“贫”到只剩几根骨，却还顾脸皮，“恐人见之，惧人责之。”（《金圣叹选批杜诗》）他劝吴郎不要吝惜几颗枣子，拒她于竹篱之外。此诗“已诉征求贫到骨，正思戎马泪沾巾”二句所表现的，正是杜甫写于成都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“广厦千间”，“大庇寒士”的思想感情。诗人由个别想到一般，一时哀叹衰乱，不禁热泪沾巾，深刻流露出对劳动人民体贴入微的感情。

（乙）对劳动生活的真切体验：杜甫在夔，始住西阁，后居赤甲。大历二年（767）春末，在瀼西“新赁草屋”，开始了新的田

园生活。同年秋移居东屯，仍兼顾瀼西农务。他象在成都一样参加田间劳动：“细雨荷锄立。”（《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》）向内行请教：“农事闻人说。”（《移居夔州作》）“耕稼学山村。”（《晚》）渐渐也成了内行：“为农知地形，”（《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》）“治生且耕凿。”（《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》）连干扰写诗也不顾：“稼穡分诗兴，柴荆学土宜。”（《偶题》）他管理生产有条不紊，既种稻米、蔬菜，又栽培果树，饲养“鸡豚”。他懂得生产粮食的重要性：“谷者命之本，客居安可忘。”他抓紧春耕夏耘。秋收时满怀喜悦：“稻米炊能白，”“尝新破旅颜”。（《茅堂检校收稻二首》）还“督勤耕牛”，及时“种秋菜。”对栽培“丹橘黄甘”，兴趣尤浓。对其他农副业也不忽视，“风落收松子，天寒割蜜房。”“盘飧老夫食，分减及溪鱼。”（《秋野五首》）黄生说杜甫田园诸诗，觉有“傲睨陶公之色，”其“气力沉雄，骨力苍劲处”，“本色自不可掩”。这些话用来评论杜甫夔州田园生活之作，最为恰切。它使我们联想到《秦州杂诗》、《春日江村五首》中的一些田园生活情趣。相形之下，这些诗篇描写的农村风味，更觉生动。

（丙）对劳动人民的真挚感情：杜甫在夔，一再迁居。为了照管农务，往来瀼西、东屯，同当地劳动人民有了更多接触。“牧童斯在眼，田父实为邻”。（《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茅屋二首》）“负喧候樵牧”，（《写怀二首》）“全生狎楚童。”（《秋峡》）他朝夕为伍的都是牧童、田父与樵子。他不羡慕轻裘肥马的“朱门”富豪，却愿与安于“藜藿”的“白屋”（《甘林》）贫老交朋友。不仅“拾穗许村童”（《暂往白帝复还东屯》），“枣熟从人打”（《秋野五首》），还“西成聚必散，不独陵我仓。”原因是“感此乱世忙”，决非为“要仁者誉”。

（《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，清晨遣女奴阿稽、竖子阿段往问》）

夔州民族杂居，杜甫因农务的需要，使用几位“獠”汉男女童仆，从事伐木、引水、筑栅、养鸡、种稻、种菜、培育果树等劳动。“儿童解蛮语”（《秋野五首》），既克服了语言障碍，又待以厚道。他尊重童仆的劳动，“日曛惊未食，貌赤愧相对，浮瓜供老病，裂饼尝所爱。”（《信行远修水筒》）为信行“触热”“往来四十里”修水筒而写，表现了杜甫对信行的体恤。《示獠奴阿段》为阿段引泉而作。肯定阿段能接筒引泉，表扬他不与“郡人”争“水”，“独”自“寻源”的品行。很有陶潜“此亦人子也，当善遇之”的思想境界。《课伐木》写为“补”“藩篱”之“缺”，给“隶人”布置伐木任务。“晨征暮返”，“人肩四根已，亭午下山麓。”“尔曹轻执热，为我忍烦促”。“报之以微寒，共给酒一斛。”合理安排作业，完全量力而行。王嗣奭说杜甫把“犒劳仆人”“入之于诗，具见真恳之意。”

杜甫还在云安，就对那里的劳动者——“负盐出井”、“打鼓发船”（《十二月一日三首》）的男男女女，发生兴趣。到夔后，对他们更渐熟悉。夔州有高山、大江，采薪、驾船，成了劳动人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之一。《负薪行》、《最能行》对他们的生活有真实刻画。《负薪行》对夔州贫苦劳动妇女寄以深厚同情，是对她们的生活真实写照，在中国诗史上是少见的。夔州“坐男使女立”的“土风”，是母系社会习俗的残存。全家的生活和缴纳赋税的重担，都压在妇女肩上。谋生之路只有卖薪捎盐。“筋力登危”，“死生射利”。她们服饰寒伧，“地褊衣寒困石根”，诗人不禁发出不平之鸣：“若道巫山女粗丑，何得北有昭君村？”夔州妇女“粗丑”，乃生活折磨所致，与地